

面对自己

王安忆 著

典藏
版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典 藏 版

面对自己

王安忆

◎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面对自己 / 王安忆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04-6295-6

I . ①面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8878 号

面对自己

王安忆 著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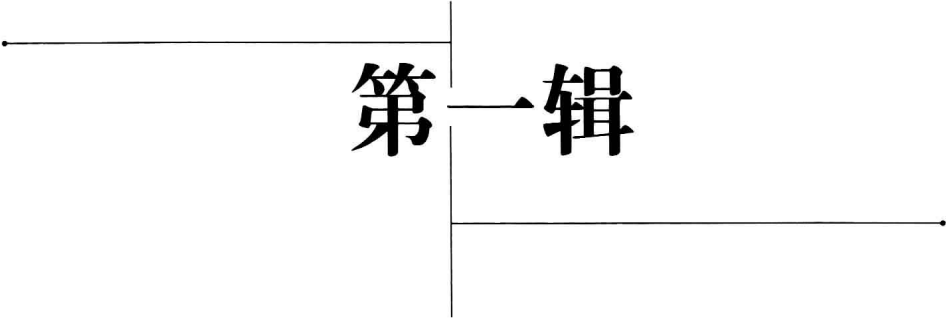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210,000

ISBN 978-7-5404-6295-6

定价: 28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5983028



第一辑

目 录

第一辑

我在少体校 /1

我的老师们 /3

花匠 /7

烧鸭子 /9

思路 /11

绿色的叶子 /13

“你要做什么呢？” /15

归去来兮 /18

书法和雕塑 /22

可惜不是弄潮人 /24

美丽的孩子 /27

看海的日子 /29

乘火车旅行 /31

后院 /33

上海与北京 /35

服装一二三 /38

警察的故事 /41

见葛优 /43

老李 /45

投奔唐主任 /48

夜走同安 /52

龟背 /55

夕照 /58

关于煤炭的片断 /60

我的业余生活 /65

岳丁的故事 /68

关于家务 /71

关于家庭 /75

那年我们十二岁 /79

杏茶 /81

拽子 /83

怀念萧军先生 /85

第二辑

独语 /90

去了再来 /92

一岁一本 /95

面对自己 /99

经验的检讨 /103

不要的原则 /106

本命年述 /109

艺术的道路 /112

纵深掘进 /117

叙述的登场 /119

回到初衷 /121

捡石于途中 /122

上海的女性 /124

虚构之余 /127

艺术是一个过程 /130
一挥十年 /135
我为什么写作 /137
说说《69届初中生》 /141
英雄的故事 /143
插队后记 /144
再读《命运交响曲》 /146
名词解释 /148
给人物起名 /150
人世的沉浮 /152
“香港”是一个象征 /154
我们以谁的名义 /156
没写完的故事 /160
新的自然，新的观望 /162
我写《小鲍庄》 /165
再谈《小鲍庄》 /168
《流水三十章》随想 /169
最远和最近 /171
几点解释 /173
漂荡的舟船 /174
关于《叔叔的故事》 /175
岁月是条河 /176

第三辑

阅读的要素 /180

上海的故事 /182
见性 /190
重大的心灵情节 /192
英雄人物 /193
阿东的语录 /195
琼瑶给了我们什么 /197
走出凤凰 /199
雅致的结构 /202
坚不可摧 /209
市井之趣 /214
关于“死”的文章 /217
年轻多么好 /218
欢喜渡 /220
我们在做什么 /226
往事重读 /238
看电影 /246
我看《马》 /253
我看《情人》 /256
《薪传》的重负 /258
《背叛》的彩排 /261
上海方言剧里的人生 /264
“现代”的概念 /266
我看电视 /269
小品 /271

后记 /274

我在少体校

说起来，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不记得当时是如何混进区业余少年体校篮球班的，并且经受了几次筛选尚存在，至今想起来，还是个奇迹。或者因为我有一个常被人误以为“留级生”的身高，或者只是出于历史的误会。我是个反应特别迟钝的人，体育课上，常常对老师的指令茫然不知所措，竹竿是永远爬不上去，鞍马是永远撑不过去，游泳则永远学不会换气，只能屏着一口气尽力憋得更长久而游出稍远一些。唯一合格的跳高，也是仗着两条长腿侥幸跨过去的。

不管怎么，我进了少体校，事实上却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班上有一二十个女孩子，还有一个女指导，我们都叫她李指导。她戴着一副眼镜，神情很严厉，不笑，也许她经常笑，但我总觉得她是不会笑的。她使我感到惧怕，惶惶不安。她对我从没有满意过，无论是上篮、投篮、传球、运球，总能给她挑剔出无穷的错误。她常常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一边，让我无穷无尽地重复着一个别人早已过关的动作。最令她恼火的是，教学比赛时，当双方为争球在拼搏，我会丢人地退缩出来。开始她批评我，指责我，呵斥我，我觉得马上要被她赶走了。就像以前好几位伙伴那样，训练结束后被叫到一边，谈上几分钟话，然后回到更衣室，一边换衣服一边哭着。我觉得，如果要我走，我绝不会哭，我已经巴不得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呢！然而，看到指导发怒，心中却又十分担心起来，被淘汰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何况，这里除了艰苦的训练外，毕竟还有很多东西在吸引着我。

比如，这里有一批与我同等身高的伙伴，不必像在学校里那样为自己的“鹤立鸡群”而感到不安和羞辱。再比如，隔壁的体操班上，那吊环是极好的。一人吊着，再由别人推着荡来荡去，是我们最喜欢的事。只要那些高班学生不在，便不会有被撵走的危险。

诸如此类的快乐，还有许多。也许正是这些，才使我克服着与生俱来的胆怯、迟钝、好吃懒做，坚持着没从那里逃走。

然而，我终于还是逃走了。这里太苦太苦了。长跑到最后几圈的时候，哑铃举到最后几下时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马上要闭过气去，昏倒在地，甚至死掉。当然，事实上并没有，可我却实在惧怕了。尤其惧怕的是在球场上的不知所措，我怎么都不理解如何可能从一个带球疾跑的人手中抢走球，或者一边跑一边带球却要防止别人的抢夺，我觉得这是绝对做不到的。当我空着手无所作为地在球场上奔来奔去时，自己都觉得那被淘汰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。于是，我决定自己走了。我再不去训练了，我感到很轻松。可是，后来想起来，常常感到遗憾，常常想念那里的生活和伙伴们，居然又记起了李指导许多次温存：有一次，我的手指头拧筋了，她为我活动着，安慰我说：“不要紧，别娇气。”她分明是微笑着。那一次，我兴冲冲去买菜票吃饭，却遭了拒绝，因为学校新规定离家近有条件的同学，一律不得在食堂搭伙。她掏菜票为我买了一盆炒肉片，还有一只蛋。在这回想中，篮球也有了种种的好处……于是，我心里便充满了惆怅，可我终究没有勇气再回去，我实在干不了这个，我自认为没出息。然而自此以后，便对一切球类运动升起了极大的崇拜和尊敬。当女排获冠军之际，我不由想起了自己在少体校的一年生活，这是极可耻的一年，最终我还没弄懂，在球场上我究竟应该做什么。可是，在那里吃尽的一切苦头，却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我的老师们

这半辈子，虽未上过几日学堂，老师却很有几位在脑海中或深或浅地的留下印象，不曾忘却。

入小学一年级，是一位姓徐的老师教导，当时觉得她颇高大，现在想来却是身材小巧的。对老师的尊重和敬仰似乎是无条件的，或许是上千年来“师道”无形的遗传，以至有别班的小朋友指出那老师外形上一项不足的时候，我气得几乎要昏过去，深觉受了伤害。我们自始至终不知道老师的名字，打听老师的名字便像是亵渎了，然而那名字又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，像是很神圣的秘密。她对我们是至高无上的，即便是平常的一句话，在我们也成了不可违抗的圣旨。在她当着众人嘲笑我一个习惯性的不良动作时，我的伤心是不可言喻的。长大以后，我深知她并无恶意，可是当时，我对她却起了一种畏惧的心理，再不敢去亲近，不敢爱她了。每天早上，我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排队站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升旗仪式。庄严的国歌奏响了，国旗徐徐上升，忽然从人行道上飞跑来一个小女孩，扑在徐老师身上，大叫“妈妈”。徐老师的脸一下子红起来，要笑又忍住了，别着头，看也不敢看孩子一眼。以后的日子里，随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情节，老师一次比一次显得年轻起来，于是，那对我不经意的伤害也逐渐变得可以原谅了。

升上二年级时，换了一位张老师。她的名字一上来就赫然地印在我们的作业本上。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一点，老师的名字引不起更多的神秘感。现在回想，她是颇不漂亮的。然而，小学生对老师，就好比

孩子对妈妈一样，从不会想到“漂亮”或“不漂亮”。老师就是老师，至多再有个名字，便完了。她是一个能干的老师。自从她来了我们班，我们班便在卫生、纪律、墙报等等方面跃为先进，得来一些奖状。而且她是那么活泼，永远令我们感到亲切。不久，我们满九岁了，要建队了。选举中队干部时，我无限委屈地被这位老师武断地拉了下来。虽然，我得了满票，却要让位给一个只得了零票的女生。至今也不能彻底明白，那位女生为何如此不得人心。只记得她乖巧过人，颇得老师器重，抑或正因为如此而引起的逆反心理吧！当时群情激愤，事情很难收场，张老师只得把所有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开会。这待遇不是每个人可以企望得到的。参加会议的同学自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心，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，与老师同心同德。事情过去了，可对老师的失望却永远不能消除地存在了心里。

在我们那个年纪，对老师的要求近乎是苛刻的。老师永远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出现，而总是真理、公正、正义、觉悟的化身。我们的问题，永远期待着在老师那里得到解决和回答，如果得不到，便愤怒透顶。然而，事实上却常常得不到。因此，某一位老师扯了某一位队员的红领巾，某一位老师与某一位老师颇不严肃的调笑，某一位老师错怪了某一位学生，某一位老师春游时带了三个荷包蛋而不是两个，到了小学开展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全成了大字报上要命的内容。文理不甚通顺的大字报雪片似的向各位老师扑面而去。

从此，一个老师不像老师、学生不像学生的时代开始了。

事情果真是这么奇怪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乱哄哄地进了中学以后，第一次见到老师，无冤无仇的，我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那老师好好地来问我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我不但不回答，还朝他翻眼。至今也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总之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与老师间便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却又针锋相对的角斗。

一次开大会，因为没有呼口号，严格地说是没有扬起胳膊，老师便请来工宣队当众喝斥，骂出许多不堪入耳令人生疑的话，骂完之后扬长而去，不负任何责任。老师的表情甚是微妙，并无笑容，却掩不住得意，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这样羞辱学生的，而工宣队能。我们则明白，是无法向工宣队要求澄清道歉的，只能找老师。当我们和这位老师面对面地坐下来的时候，才发觉彼此都是那么孤独无助。

后来，就到了林彪搞一级战备的日子里。

我们正在乡下参加“三秋”，这会儿就决定不返上海继续在乡下坚持战备。当时，我在学校小分队里拉手风琴，我是不情愿在小分队的，因为我在班上有个极要好的同学，假如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，农村的日子对我们将是不堪忍受的。负责小分队的一位江老师居然答应我白天在小分队活动，晚上派人送我回班级所在的生产队睡觉。他从不曾爽约，即使实在派不出人，他也要自己亲自送我。到了战备的那一刻，大家想家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强烈起来，并且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，那家像是再也回不去了，我总是哭了又哭。永远不会忘记，在这个绝望的时刻，江老师借口修理手风琴，让我回上海三天。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手风琴，回到了家。家里只有老保姆带着年仅五岁的弟弟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的床全揭了起来，露出棕绳绑的床绷，一派凄凉。可是后方尚在，心里毕竟安稳了许多。三天之后，我如期回到乡下，下了长途汽车，我径直去了小分队。

我们和老师一起度过了“战备疏散”的三个月，他和我们一起步行十几里买大饼油条解馋，和我们一起用酱油拌粥下饭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他在对着墙角擤鼻涕，居然也没觉到太多的失望。有时高兴起来，我们就直呼他的名字，他也很自然地答应。而另有一些时候，我们却极其庄重地唤作“江先生”，尽管“师道”已经彻底粉碎。

三年中学，就这么吵吵嚷嚷、哭哭笑笑地过来了，迎接了“一片红”

的插队落户。我的插队“喜报”，就是这位江老师来贴的，我不在家，当时没碰上。之后，也没有机会再碰上过他，心里便越来越觉得他那次是来告别的。

与老师日益增长的接近中，老师越来越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普通人的素质，于是便令人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，然而，随着这失望，“老师”的形象却也日益真切起来。当我长到也应为人师表的年纪，方才感到，做个老师是极难极难的，而我们对老师的要求也不甚公正。老师亦是人，也有人之常情，对老师的尊重，首先是对人的尊重。或许把“师道”合并于“人道”，事情倒会简单许多。

一次，参加虹口区三中心小学毛蓓蕾教师主持的“儿童团”入团式，宣誓的时候，毛老师站在一群年仅六岁的孩子中间，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，鲜红的领巾映着她苍苍的白发，我的眼泪涌了上来。这庄严的一刻令我铭记终生。我终于明白，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亦是一个伟大的人。

花 匠

妈妈工作的作协机关里，有一个大花园。花园里有草坪，草坪上有一尊鲁迅石膏坐像；花园里有喷水池，池中间立着一个半裸女人的雕塑；花园里有葡萄架，还有花房——不知为什么，我把它叫做娃娃的房子。

我们常常到这里来玩。

在草地上打滚，顺便给鲁迅公公磕个头。摘枸杞子，摘葡萄——那葡萄大都是青而硬的，可我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吃了下去，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。

玩到后来，不禁放肆，把个机关花园误以为儿童乐园，大闹起来。当我们肆无忌惮地在花丛里跳来跳去时，就会受到花匠严厉的目光的阻止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们。两脚稍稍往两边分开，两只胳膊再朝两边分开一些垂着，手里握着一把剪枝的大剪刀。他微微地驼着背，从不大声喝斥我们。但他从不和我们说话，只是那么冷淡，生气，对我们一无兴趣、一无希望地看着，叫我们自觉地对他敬而远之。远远看见他过来，我们便逃窜开去，也不知怕他什么。他是那么瘦弱而苍老，完全不值得害怕。而我们却那么怕他。

当人们纷纷向我妈妈告我的状时，他也站在旁边，看着我。一言不发，那目光分明是谴责的。他似乎不屑于把那谴责说出口，似乎已对我们失去了任何悔过自新的信心。在他的目光下，我是那般的不可救药。

一次，我们在大厅里打乒乓。打到高潮时，我把短裙子脱了，只穿短衣短裤。一个调皮的伙伴和我捣蛋，把我的短裙子藏了起来。而他自己则逃之夭夭，不知所向。毕竟已到了知道害羞的年龄，我晓得，只穿

一条短裤是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。于是我只能绝望地在大厅里等着，等着他良心发现，把裙子给我送回来。可是他一直没来。眼看太阳快要落山，天色已近黄昏，我只得决定走出大厅去找他。当我穿着短裤横穿过花园时，看见了花匠。他默无言地站在那里，看着我。稍稍分开两脚，又稍稍分开两手站着，手里握着一把大剪刀。我低下头从他骇人的目光下跑过去，自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堕落。

花园里的欢乐，是以一场大祸为结束的。有一天，水池边上一只会喷水的青蛙忽然之间在我们脚前落下水去。捞起来时，青蛙的扁嘴已经磕去了一块。自始至终，我们都感到委屈，因为那青蛙落下水去的时候，恰恰是在我们静默的时候。我们抱着膝盖坐在池边上，对着水池正想默一会儿神。不料却惹出了这场大祸。我们是那样仓皇地告别了这座大花园。这场大祸以及后来引起的一切，像一团浓雾，遮隐了花园给予我们的所有的快乐。

好多好多年过去了，我以自己的身份，而不是妈妈的女儿的身份，又走进了这座大花园：有时听讲座，有时座谈，有时联欢，有时接待外宾……花园的草坪依然很绿，半裸女像依然立了起来，葡萄架上依然挂着青青的葡萄，青蛙的嘴角依然缺着一块，花草树木，依然凭着季节青青黄黄，开开败败。那一团浓雾在阳光下消散尽了，可浓雾后面出现的花园却不再是原来的花园了：娃娃的房子那里，竖起了一座新楼；鲁迅像漆成一种暗金色。而且，花园好像是小了许多，它不再是儿时所见的那样大而堂皇了。

花匠还在，老而且瘦。

一天，我在门厅里和人说话，他忽然走进来，站在门边的暗地里，看着我。看了一会儿，又悄悄地走了。我奇怪地瞅瞅他，瞅见他驼着的瘦削的背脊。那疲惫的背脊流露出一股说不出的、淡淡的温和。我忽然想到：他大概是喜欢我的。

烧鸭子

犹如从小喜欢“办小人家”一般，我喜欢烧菜。最初的失败遭受了无穷的羞辱，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，不仅是技术上的，还有舆论上的，终于得到了认可。然而，仅止是一些炒菜，小菜而已，大的作品还未敢上手。除夕的早晨，我决定要烧一只全鸭。

先将菜谱温习了几遍，那菜谱是从报纸上剪下贴在一个本子上的。然后就是整理鸭子，鸭子是隔天从菜场买来的一只光鸭，喉管已经剪断，垂着一条半裸的脖子，褪得半净的羽毛掩着粗大的毛孔。顺着脖子往上看去，则是一颗毛茸茸的脑袋，睁着空洞而悲戚的眼睛，不由得手软。定了定神，开始清除残余的细毛。鸭子肥硕的身体摩挲着手心，心里就有些发颤，亵渎了什么似的。分明也是一具生命的肉体，却总是怪异。那翅膀僵硬地曲伸，一松手，便弹了回去，像在抗议什么。一只手轻轻扶起杂毛丛生的脑袋，另一只手沿着嘴、耳、眼的边沿摘毛，那脑袋里像是有着思想似的沉重。第一次那么仔细贴近地端详鸭子的面貌，像是不认识了。原先，只在餐桌上，小河里，或卡通片中看过鸭子。清除完毕，出了一口长气，心里说道：“这只鸭子我是不吃的。”

接下来，是开膛，操起锋利的剪刀，伸进原先开好的狭窄的口子，狠命地剪下去，一颗心擂鼓似的乱跳起来，只当那鸭子又活了。刀锋清脆地咻咻响着，留下一路鲜艳的内脏，几乎要惊叫着逃跑。可是四下里寂寂然，没有一点回应。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一只牺牲的鸭子，逃也逃不了，已经没有后退的选择。咬着牙将手伸进敞开的肚子，夹着冰块